



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基金项目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编委会

主 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任天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任天石 许 钧 张一兵

张凤阳 周 宪 周晓虹

倪梁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广 / 松 / 哲 / 学 / 系 / 列 /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任天石

物象化论的构图

原著 【日】广松 涉
翻译 彭 曦 庄 倩
审订 张一兵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广松涉：关系存在论与

事的世界观（代译序）

张一兵

广松涉，当代日本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大师。在中国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域中，他基本上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广松那兼容了新科学观、当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以及带有浓郁东方文化色彩的哲学思想博大而精深。1994年广松涉去世之后，他的影响正在逐步扩大。我个人认为，了解广松哲学对于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参考价值。因为我注意到，国内的一些学者正在试图将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的某些哲学思想的研究链接起来，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以达及一种“对话”和“开新”的新地平。而广松涉的哲学正是这一理论侧度上新马克思主义式的成功典范。我们需要看一看人家的已有成果，这包括其中的成功与教训。

当然，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由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基本上是以原苏联那种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居统治地位，以至于广松往往被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遭到贬

斥。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界也曾经译介过一些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论著,可恰恰遮蔽了广松涉。特别是当他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推出自己的“事的世界观”哲学体系后,那些教条主义的论者们诸如“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1〕}、“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接踵而至。^{〔2〕}进入二十一世纪,广松哲学的光泽在拂去历史灰尘之后,终于又开始褶皱生辉起来。这里,本文只是对他的生平和哲学思想作一概要式的介绍。

—

广松涉 1933 年 8 月 1 日生于日本的福冈柳川。1944 年,小学五年级时他迷上了爱因斯坦,并立志要当一名物理学家。这是他思的起点。1945 年,广松涉作为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通过阅读卡尔·皮尔逊所著的《科学概论》,对马赫产生了强烈印象。马赫的关系式的感觉要素图景成了他步入现代科学构架的重要路径。也是这一年,年仅 12 岁的广松在伯父的影响下,不可思议地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由此奠定了他左派思想的学术基根。1947 年,时读中学二年级的广松涉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心思想是讨论核爆炸,重点阐述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优势。1949 年,年仅 16 岁的广松涉正式加入日本共产党。从此,广松涉的一生就始终是为社会主义战斗的一生。

1951 年,广松涉开始意识到近代自然观(实体主义)向现代自然观(关系主义)的转变意义,模仿黑格尔的《逻辑学》写

〔1〕 参见参坂真:《现代的思想状况和马克思》,载《前卫》1983 年 1 月号。

〔2〕 参见吉田杰俊:《现代思想论》,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第三编。

成了14本“关系逻辑学”的笔记。1952年,他报考东京大学理科不第,转而进入东京学艺大学数学系,同年开始系统学习哲学,并决定从物理学转向形而之上的哲学。1954年,广松涉终于考入东京大学(文科)。可其间,又多次因革命活动中止了学业。1957年,广松涉正式进入东京大学文学系哲学专业。不久,他将毕业论文题目由入学时所预定的哲学家黑格尔变更为科学家马赫。此举深受桂寿一主任教授的称赞。学间,作为前提作业,专心致力于现象学和新康德派研究。每天在图书馆学习之后,坚持到红露外语学校学习德语。次年,广松涉精心致力于康德、黑格尔、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到夏天,已经基本奠定了毕业论文的主要内容。1959年,广松涉在东京大学文学系哲学专业毕业。毕业论文题为《浅论认识论的主观》(收录《广松涉全集》第16卷)。在这篇论文中,他已经开始构筑交互主体性、四肢结构论等广松哲学的基本框架。同年,再入东京大学文学系哲学专业进行研究生学习。1960年,他开始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文本结构问题,直接批评苏联的阿多拉茨基版和梁赞诺夫版在编译上的非法文本重构(由此导引了后来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1965年的巴加图利亚新译本的问世)。次年底,完成了题为《康德的先验演绎论》的硕士论文。1964年,广松涉在东京大学文学系哲学专业继续博士课程学习。其间,与须藤吾之合作翻译了马赫的《感觉的分析》一书。1965年,广松涉在获得了博士课程的学分之后,从东京大学退学,从此,走上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职业哲学家的道路。

1965年以后,广松涉先后任名古屋工业大学讲师(德文)、副教授(哲学和思想史),1966年,他又出任名古屋大学基础部讲师和副教授(哲学与伦理学)。1976年以后,广松涉出任东京大学副教授、教授直至1994年退休。同年5月,获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同月,广松涉因患癌症去世。

广松涉生前出版论著四十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在他去世后,出版有《广松涉文选》6卷和《广松涉全集》16卷。现在,广松涉已是日本学界公认的当代哲学大家。纵观广松涉的思想发展进程,可以看出青年广松涉是从对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的关注进入理论研究的,在这一方面他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见解(《科学的危机与认识论》1973年、《相对论的哲学》1986年),这也是他后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建构广松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和逻辑视角。同时,广松涉哲学之思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是西方哲学。先是康德、黑格尔,然后是胡塞尔和新康德主义,还有舍勒、梅洛-庞蒂,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海德格尔。在这方面的论著有《黑格尔》(1976年)、《梅洛-庞蒂》(1983年)、《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1986年)、《现象学的社会学原型——许茨研究笔记》(1991年)。

如前所述,二战以后,在大学读书的广松涉直接投入了日本新左翼的学生运动,也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他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一开始,他就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金科玉律,而是以独立的探索精神来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一点上,他的理论逻辑思路十分接近西方马克思主义。广松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献学地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这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像》(1971年)、《新编〈德意志意识形态〉》(1974年)、《资本论的哲学》(1974年)、《马克思的思想圈》(1980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生学研究,其中出版有《恩格斯——其思想形成过程》(1968年)、《马克思主义的确立过程》(1968年)、《马克思主义的地平线》(1969年)、《青年马克思论》(1971年)、《马克思主义的路径》(1974年)、《物象化论的构图》(1983

年)、《以物象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1986年)。三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关系,主要论著为《现代革命论探索》(1970年)、《“现代超越”论》(1975年)、《新左翼运动的射程》(1981年)、《历史唯物主义与国家论》(1982年)、《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史观》(1986年)。

当然,对广松涉来说,在当代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十九世纪的文本中,而要在当代科学和社会实践的新层面上将其“推进”和“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是广松涉自己的哲学体系——“事的世界观”(《世界的交互主体性的构造》1972年、《事的世界观的前哨》1975年、《物、事、语》1979年、《辩证法的逻辑》1980年、《佛教与事的世界观》1981年、《存在与意义——事的世界观之建基》计划三卷,其中第一卷1982年出版,第二卷1993年出版,第三卷因广松涉1994年的去世而未果)。下面,我对广松涉的哲学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二

在广松涉看来,自考茨基以来特别是苏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形成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武断地一分为二,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物质实体为基石的辩证唯物主义被确立为第一哲学,它在自然界的运用是自然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运用是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这种观点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创立哲学新世界观时的原像,而是一种带有旧唯物主义色彩的教条式的机械决定论诠释体系。而另一方面,在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中(在日本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思想波动即是所谓六十年代“主体性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被错误地理

解为一种关注人类主体的人道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片面诠释的两极。正是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在今天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正是利用了这种错误来攻击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失败了,并企图以此来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广松涉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回到马克思”,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初始理论地平。

广松涉明确反对用某种教科书体系去反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做法,他主张以现象学(释义学)的方法来对待马克思。具体说,就是以一种文献研究甚至“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来重现文本的初始视界。他将其称为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像”和“地平线”,这也是我们科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前提。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广松涉 1974 年在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编辑版》一书中的研究情境为例。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 1845~1846 年撰写的这部重要哲学论著,在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并且其中最重要的第一章手稿还是尚未完成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撰写的情况看,原稿由五个手稿构成。在后来的保存中其中第一手稿又遗失了 12 页。现在我们一般研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文本,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在这一文本中,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是以 1932 年苏联学者阿多拉茨基的第二版(第一版由梁赞诺夫 1924 年整理出版的)为基础的。由于这一版中打乱了马克思恩格斯原稿的顺序,并按照编者的理解进行了重新编排,人们已经很难看出第一章的原貌。也因此,1965 年由巴加图利亚整理编排,重新出版了新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这一版本中,再一次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原有结构,增加了新找到的三页手稿,并复原了被删去的全部文字和修改记号。

1966年东德用德文发表了这一新编手稿,1988年我国的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以这一版本为基础的新译手稿。^{〔1〕}这一版本为我们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始理论线索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可就是对于这一手稿,广松涉仍然不满意,1974年他重新推出了另一个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文献版。在这里,他直接以手稿的照像版为据,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手稿(66页)与后来的修改文字(23页)进行了同页分立式排印,而将所有的删除文字和修改记号直接还原到原来的手稿的文本空间上。^{〔2〕}以此试图最真实地重现马克思恩格斯撰写手稿时的初始情境。广松涉正是以这样一种研究情态来寻求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基础的。所以,他以众多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为据,认真研究过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研讨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过程和理论本质,解读过《资本论》,从而提出了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独特的见解。

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生学研究中,广松涉十分特别地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于1845年(在时间断面上这一点他同阿尔都塞),但这不是什么抽象的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断裂”,而主要表现为青年马克思的人学实体论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实践关系存在论的转变。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时思想逻辑中,他的这种观点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即战后一定时期中一些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紧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潮,以人本主义的异化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诠释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

〔1〕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 广松涉编译的这一稿本,除去日文版,同时还附有一个德文原文版。河出书房新社1974年版。

被确证为所谓“主体唯物主义”或“人(间)学唯物主义”(船山信一)。广松涉坚决反对这种理论倾向。在这一点上,他又在理论逻辑深层同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阿尔都塞的逻辑反拨。^{〔1〕}以他的分析,在马克思 1844 年的劳动异化理论中,虽然 he 已经开始以“人”(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类本质)去替代黑格尔主义“主体—客体”同一逻辑框架中的绝对观念,但这仍然是非科学的。^{〔2〕}因为异化理论先验地预设了(A)=人未被异化的本真存在;(B)=异化的非本真人类存在;(C)=通过异化的扬弃恢复人的本真生存。历史成了 A→B→C 的人的异化与复归过程,这仍然还是隐性的黑格尔神学构架。^{〔3〕}而此时作为青年马克思人类主体类本质的劳动,实质上还是一种先验的主观价值实体。广松涉认为,正是施蒂纳对人本主义的批判给予了马克思的思想以重要的理论冲击。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否证了施蒂纳为了反对费尔巴哈类本质人本主义,而提出的“实际存在的个人”之后,才开始回到现实历史之中来。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必须克服一般的以人为实体即主体的‘人本主义’,这不仅是规定了类本质的费尔巴哈之流的‘人本主义’,而且也包括规定了个体存在的施蒂纳之流的‘人本主义’在内”。广松涉以为,在 1845 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是抛弃了一切旧的实体性(=先验主体)的人本主义哲学构架,才创立了以实践(海德格尔的上手性,广松涉将其译为“用在性”)为基础的关系本体论。关于这一

〔1〕 参见拙著:《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南京出版社 1990 年版,第九章。

〔2〕 参见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15 页。

〔3〕 参见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第 54—55 页。

点,广松涉的分析有其深刻之处。

依他之见,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重大的哲学变革中,从来没有特意建构一个哲学逻辑体系,但他们确实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视界。在马克思最初的哲学原像中,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实体、人类实体和唯心主义的观念实体都不再被视为是第一性的,而实践(=上手关系)是第一性的。哲学的对象在这时被根本改变了,原来那种旧唯物主义直观的理想化的自然物质或抽象的人都不再是哲学的主要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已经是实践之上的“历史的生活世界”。在这里,广松涉的解释显然是有失误的。承认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中的重要地位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通过简单地抬高实践的本体地位实现的。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立场上的马克思从来没有否定自然物质存在的第一性,而是确定了同是第一性的自然物质存在和社会实践中,后者更重要的逻辑基始性。但这绝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第一性。^{〔1〕}

当然,广松涉强调实践的本体地位并不是像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家和日本的主体唯物主义者那样是为了确证主体性,而是凸现一种关系存在论。这也就是说,广松涉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真谛是一种**从实体本体论向关系存在论的转变**,这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决定性地超越了近代哲学“主—客”定式。实践是现实的关系,在新世界观中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实践上扬弃和统一主观性与客观性……等等二元对立的”^{〔2〕}。“马克思恩格斯自我批判性地扬弃了‘实体—主体’这一自我外化和获得自我的‘异化论’结构,与这种

〔1〕 参见拙文:《先在的自然、基始的实践与第一级的生产》,载《哲学动态》1994年第3期。

〔2〕 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第40—41页。

转变相一致,他们决定性地超越了立足于近代哲学之上的‘主观—客观’图式的地平本身,直至提出了社会、历史理论的新范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的新地平’。”这里的核心理念就是人类生存实践基础的物质生产。正是生产(“工业”),这一人对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能动关系中,才形成了历史化的自然和自然化的历史。^[1] 马克思哲学的逻辑本体就是关系(相当于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一定历史时间中的“去在世”)。在马克思的科学文本中,他总是把人们通常看作是实体的东西(相当于海德格尔的“在者”),重新彰显为“关系”。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实体存在),而是为颠倒的物象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因为任何实体都不能离开关系而存在。物质实体、“自然首先是以与生存实践的关联相适应的表相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谓的“上手(道具)性的存在”。而社会生活也就是实践关系中的“历史的生活世界”,即所谓“在历史世界之中的存在”。广松涉认为,与海德格尔一样,马克思就是要超越个人与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摹写论与构成论的二元对立。^[2] 这就难怪日本学者要批评他是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了。^[3] 与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的做法不同,广松涉不是将海德格尔与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嫁接起来,而是将海德格尔与中晚期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结合起来。^[4]

[1] 参见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第41页。

[2] 广松涉:《“现代超越”论》,朝日出版社1975年版,第249—250页。

[3] 参见参坂真:《现代的思想状况和马克思》。

[4] 我在《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一书的第二章的最后,关于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有一重要评点,即阿多诺只是在宏观逻辑前提上进行了有力的证伪,可是他并没有能真正进入和破解海德格尔哲学最重要的学理层面,即“此在通过上

在广松涉的进一步匡正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关注的既不是客观物质性也不是实践的主体性,而是所谓作为社会存在关系性本体的“主体际性”。广松涉说,在马克思那里,生产首先是一种对象化活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个体在自然的历史的各种条件制约下,通过“被投的抛入”性生产(匮乏性引起的被迫劳动),存在于自然的历史化创造之中。但是生产同时还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对象性活动”,是分工性的共同劳动,是与同时代的人及以前人们共同进行的活动,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主体际性了。^[1]以他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新视界的本质就是对这种主体际性的自觉。甚至,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论著中很少用“主体—客体”这一对范畴,因为这对概念本身就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构架的基本规定。在科学的哲学形成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都尽可能地去克服旧哲学的二元模式,而确证科学实践关系基础上的主体际性。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就是一种关系本体逻辑。马克思从来不是主张主观对客观的简单直观,而是说:“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的本质不是物质实体,也是基于实践关系的科学认识论!在此,我们再一次能感到广松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所谓“超越近代哲学”的“现代性”。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广松涉本人并不是一个在书房里不闻窗外事的学究,他十分关心日本的左翼斗争运动。甚至

手(实践的用在)建构世界历史”的本体论。所以我断定,对于阿多诺来说,“海德格尔与马克思,还是一个尚待完成的理论工程”(参见拙著:《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7—198页)。这一点,我可以再说,广松涉正是那个从正面完成这一任务的人。

[1] 广松涉:《历史唯物主义与国家论》,论创社1982年版,第111页。

我们可以说,广松涉的理论努力也正是为了他的革命实践服务的。所以,他的关系存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指归就是所物象化论的历史观。在这一理论层面上,他认为1845年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同时也是一个从劳动异化革命论向科学物象化论革命学说的转变。

对此,广松涉有过一个对比性的界定: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也从异化论引出对现存的否定性批判,但其逻辑基点是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和“当为性”(应该性):资本主义不好,是因为它违背了人性,所以它应该被打倒。而在马克思新的科学物象化论中,他则抛弃了这种先验的逻辑预设,这种新的革命学说是确立于一条现实的客观实践逻辑之上的。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科学文本中,社会历史的“本体”惟有人的“主体际的共同活动”(=关系),我们面前呈现的社会和历史不过是这种关系的物化,即社会关系本体的物相形态。这又是“在”与“在者”的异质性。在这里,物化概念被规定为以物与物的关系乃至物的实体与事物的属性来表象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在一定条件下人们日常的直接意识中出现的物相“错认”,即物象化。^[1]对于一定的社会存在,物化(一定社会分工中地位和职位的固定化)并不是所谓人的本真存在的异化,而首先是一种具有深刻必然性的“普遍有效”的事态,人们就是对这一社会方式存在着物象化式的错认,其本身也是与这种生存模式相关的,这不是一种简单的错误和“谬误”。物象式的错认本身也是历史的。他认为马克思不仅批判性地阐明了经济现象中的物象化问题,而且对若干历史现象、社会

〔1〕物象化,广松涉专门标注过德文 *Versachlichung*。这是广松哲学中的一个极关键的重要范畴。此词德文原意为使之具体化,成为某事情。广松涉将其区别于 *verdinglichung*(物化),专门译作“物象化”,并以此标注晚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本质。